

知识分子
译丛

主编 周宪 许钧

知识分子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美学、政治与学术

[美]布鲁斯·罗宾斯 编著

王文斌 陆如钢 陈玉涓 林 波 译

王文斌 校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美]罗宾斯(Robbins, B.)著;王文斌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知识分子译丛)

ISBN 7-214-03133-7

I. 知... II. ①罗... ②王...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世界 IV. D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810 号

Intellectuals: Aesthetics, Politics, Academics

Copyright ©1990 by Bruce Robbins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1999-073 号

书 名 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
著 者 [美]布鲁斯·罗宾斯
译 者 王文斌 陆如钢 陈玉涓 林 波
责任编辑 刘沁秋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页 2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33-7/D·497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的图景日趋明晰。“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

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专业社会中职业分工越加细密,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中,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

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 宪 许 钧

2001 年 6 月于古城南京

中译本序言

《知识分子》一书编写于美国当时所谓的“文化战争”时期，因此带有这一历史时代的印痕，而这一历史时代却迄今尚未完全成为过去。

当时的这场文化战争，是围绕国家给艺术和“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旨在使妇女和少数民族平等享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政策)拨款资助等诸种争端展开的。概括地说，这场“战争”的焦点是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在左派看来，国家需要履行一些事情，以纠正社会的各种不公，这些社会的不公现象沿袭于美国的过去并继续存在于1963年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以后的岁月里，而国家对此的反应却软弱无力。在右派看来，国家的这种反应应该受到谴责，国家对社会干预不力，尤其是对经济管理不善；认为对经济最好是任其自然，国家无需干预。在某些方面，共和党似乎已对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民主党表面上支持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妇女，这已使民主党自己四面树敌。属于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一些团体在传统上支持民主党，可现在在经济方面受到了威胁(受到了共和党支持的整个全球化的威胁)。假如共和党能迎合这些人所谓的“家庭价值观”(family values)，尤其是这些人对关于种族、性别和性征的保守观念的执著，那么这些人是可以被争取过来的。譬如说，当传统重工业移向国外，转移至低薪地区时，男性工人因此所产生的担忧，并

不是自己的失业。他们难以排遣作为男人,尤其是作为白人男人所体验到的各种担忧,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享受以自己的男子气和白人属性为基础的某些特权。因而,这可能会导致他们投民主党的反对票,因为民主党现在看起来太热心于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利益。他们会支持共和党,因为共和党最热衷于推行不加管制的全球化。在影响投票方面,这一策略向来是比较成功的。最为成功的是共和党削减国家各项国内计划的经费(包括大学的经费),因而摆出的姿态是降低税收,而其实是悄悄地提高国家在军事上的财政支出,包括穷兵黩武地疯狂发展类似于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且这些计划往往耗资巨大。

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可能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可是学术性人文学者(属于这一群体的人当然不会与一般的知识分子共处,一些评述人根本不会将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却被迫陷入这种文化战争的旋涡。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国家直接或间接地负责大多数学术人员工资的支付,所以,攻讦国家就等于攻讦学术人员的生存。二是因为对关于种族、性别和性征的久已约定俗成的观念的质疑,在美国以往30年的人道行为中,一直是惟一最具意义的革新和精力的源泉。(关于这一观点相互联系的理论和实践的诸方面,或许还可以再说上几句,譬如说,在一方面,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或“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是学术上的常识,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学术话语里,妇女、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呼声强劲地崛起。关于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性问题,本可以再说上几句,但这一题目太大,在此无法加以探讨。)这种质疑对文论、历史、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诸种设想和实践应该产生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人们对此长期争论不休。然而,无可争议的是,这些学科里的争议,在业内人士和业外人士看来,常常显得狭窄、专业化和个体化。这些

争议从阴影中突然并戏剧性地显现,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既趾高气扬,又烦躁不安。

但是,学术人员自己却很少觉察到此种情况。他们对右派玩弄美国的爱国主义和反唯理主义感到愤怒不已。美国的反唯理主义鄙视大学,认为大学是精英分子的集中地,大学毫无爱国可言地致力于对美国历史上受害人(黑人、印第安人、妇女)的庆贺。即便是那些热情致力于为自己态度辩护的人,对构建方式也不总是急于下结论,因为在这种构建方式里,他们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同一性也处于危难之中。较之承认任何的自我定位或自身利益,以真理的名义独立地表达思想会更容易一些,知识分子就常常是这样做的。譬如说,我们怎样才能接纳在美国的社会中作为十分重要的身份范畴的“专业人员”的集体自身利益,抑或承认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倘若没有国家基金的支持,没有放弃我们对超脱于我们的评论家的道德优越性的通常性要求,那么学术人员是不可能存在的。对在当今美国诸种社会和体制现实中我们自己本色的任何理解,看来均会降低我们不得不说的权威性。可是,惟有理解我们自己在这些现实中的定位,尽管这可能看起来近于妥协,知识分子才能决定真正需要表达的东西。

无论怎样,《知识分子》一书的前提就是美学、政治与学术。书中的各篇文章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社会文本团体的约稿写成的,并由该团体汇编而成。此书的关键词是“本色”。这一词语既表明对知识分子各种局限性(非知识分子也常常具有这些局限性)的承认,又是在另一个方面发现或获取建立地位和付诸行动的基础。承认各种局限性与建立行动的基础,这两者被认为是同一回事。毫不奇怪的是,这一想法在美国的学者中尚未赢得普遍的支持,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高尚独立的群

体,漂流于对并不显得重要的各类人的诸种制约之上,所以得天独厚地享有向权力表达真理的权利。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神话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确,只要这种神话继续给像爱德华·W·萨义德和诺姆·乔姆斯基那样的人明确表达意见和反对美国滥用其全球性权力这样的英雄壮举以灵感,那就会诱使人们放弃评论。然而,本书已对各种公共论辩和学术论争作出了长期有效的贡献。

在以往的十多年时间里,关乎知识分子的讨论的各种术语——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在美国目前依然十分活跃——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嬗变。最近,关于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各种论辩已经将焦点移离于大学,因为“个体”知识分子(即非知识分子)被认为已逃避其各种公共责任,趋向于电子大众媒介,这种情势现在被表现为最为常见地提出知识劳动具有“公共性”的要求。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力求成为出现于电视的社会名流?抑或电视仅仅是公共领域的一种虚假或降格的表现?因为在公共领域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公共性,也不可能具有富有价值的知识贡献。各种非政府组织借助其与媒体的关系可又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责任来影响或有时甚至导致关乎全球性对外政策的决定,这种有目共睹的力量已引发一些观察家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媒体是有利于政治还是恰恰相反,媒体是否给政治提供了一种危险的替代物?这一问题显然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因为自关于德雷福斯事件和朱利安·邦达的各类文章发表以来,知识分子表达反对自己国家的意见和抵御民族主义者宣传的压力的能力,已是他们最为显著的德性之一,而且被誉为是一种理想,即便能够说明这一方面的实际行动的事实少得可怜。

在将注意力转向媒体名流时,美国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如同在本书“导言”中所谈到的)已在不知不觉中效尤了早期

的法国话语。早期的法国话语已对法国知识分子不是退却于大学而是退却于媒体提出了质疑。当然,假若如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已指出的那样,媒体常常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形象,那么人们也许会从更为一般的角度重新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里,何谓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和可能地位?知识分子目前的经济依赖性和政治依赖性的各种不同形式是怎样影响了他们批判对抗性的潜能?假如本书构思于今天,那么这些问题就需要更加全面和更为精确的讨论。然而,倘若中国的读者能利用本书提出关于显然是十分奇怪的美国知识分子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民族经验这类问题,而且我知道这种情况所昭示的许多差异性至少不亚于相似性,我将会感到十分欣慰。能将此书置放于既活跃而又富有成效的关于知识分子暴风雨般的论辩之中,而且中国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辩场面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对那些负责翻译此书的人,我深表谢意。

布鲁斯·罗宾斯

2001年9月写于纽约

目 录

导言: 知识分子的根基/布鲁斯·罗宾斯	(1)
---------------------------	-----

第一部分 理论

论知识分子/斯坦利·阿罗诺维茨	(21)
走向有效的知识分子: 福柯还是葛兰西/R·雷德 克里斯南	(79)
信仰捍卫者与新阶级/安德鲁·罗斯	(124)

第二部分 访谈录

美国知识分子与中东政治/爱德华·W·萨义德	(159)
批评、女性主义与体制/加亚特利·查克拉瓦蒂· 斯皮瓦克	(176)
再谈职业管理阶级/芭芭拉·埃伦赖希	(196)

第三部分 历史个案

知识与权力(诸种)元叙事中的英语(英国人)的 特性/乔纳森·艾拉克	(210)
旧权利与新耶路撒冷:伊丽莎白·巴雷特·勃 朗宁的知识活动/迪尔德丽·戴维	(224)
从政治分歧到知识分子整合:1942—1949 年美 国政府中的法兰克福学派/阿尔方斯·泽尔纳	(252)
“福迪塔”的新手:科林·麦克凯伯与剑桥英语 /戴维·辛普森	(274)
以间谍为职业:雷蒙德·威廉斯的《忠诚》/布鲁 斯·罗宾斯	(303)
文人斗士与“红卫兵”的对阵:康纳·克鲁斯· 奥布赖恩在南非/约翰·希金斯	(322)
不可混同:保罗·德曼、法西斯主义及解构主义 /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	(352)
传媒时代的知识景观:文化表征与戴维·亚伯拉 罕、保罗·德曼及维克托·法里亚斯/达娜·波朗	(375)
撰稿人	(396)
索引	(399)
译后记	(411)

导言：知识分子的根基^{*}

ix

布鲁斯·罗宾斯

在评论国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方面，美国行之有效的批判机制业已土崩瓦解。

——小威廉·F·巴克利(1959年)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非依附性知识分子已相对减少……这是知识日益体制化，特别是知识日益学院化的必然产物。

——刘易斯·科泽尔(1965年)

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往往都带有政治性。今天，对我们而言，现在最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说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莫过于来自第三世界的教训。在这些国家中，“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逐渐消失，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的物种的名称。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6年)

各高等学府吸纳了几乎所有的知识活动，这标志着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衰落，尽管尚未完全

^{*} 编者感谢拉特哥斯大学研究基金会托管委员会为该书出版提供的帮助。——原书注

湮没。

——让·贝特克·埃尔席泰(1987年)

里根和布什政府中的右派人士已作出了一项社会公益服务的举措。

x 1984年,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在其《要求收回遗产》一书中开始反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和文化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同年,《社会文本》杂志利用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没有辩护的60年代》描述了这种种变化,并为此作了辩护。1987年,随着E·D·赫希的《文化知识》及艾伦·布卢姆的《封闭的美国心智》^①登上畅销书之列,右派近十年的“妖魔化”本性已尽人皆知。自此以后,其攻击也继续升级,然而,其结果却是自相矛盾的。显然,这些文化保守分子希望通过将这场辩论从个人职业和个人规训提升至“公共领域”来赢得足够的公众和政府的支持,并以此来重新控制这一越来越脱离世俗传统束缚的文化领域。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却轻率地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运动中所逐渐赢得的支持公之于众,即便是对那些曾经存有疑虑(甚至现在仍有疑虑)的人。右派不断地严厉指责左派给美国教育文化机构带来的影响,同时希望唤起人们对这种影响在基本前提和体制结局方面是否正常的注意。充分考虑到这些文化保守分子对训诫夸张的偏爱,右派清楚地表明,根据所谓的B氏三杀手(玛丽·刘易斯·普拉特所指的贝内特[Bennett]、布卢姆[Bloom]以及索尔·贝娄[Bellow])整理出的广泛意见的综合,该新中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活动的一个产物。

由于里根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广大公众都意识到,无论好坏,左派是美国文化生活中一支力量强劲的队伍。更出乎意料

的是，左派自身亦对此一清二楚——它已习惯于纯边缘文化既严肃又活泼的舒适，习惯于业已被剥夺但毕竟仍存有的略显夸张的自我形象：内心放逐、异化、超然而自在的反抗。面对右派的攻击，产生了某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某些明显扎根于现实的事物，某些业已实现或获取的事物——这些事实成为右派攻击而左派维护的焦点。这一广大公众的共识，尽管是批评的，却迫使左派知识分子承认其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他们的文化与体制的成就。

正是这个奇异而又未被人们广泛意识到的未竟成功故事，xi
将知识分子的话题重新摆上了议事日程。

由前文中的引文可以看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均赞同并大肆宣扬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的观点。这种扰乱人心的共识却对这一多义的标题“知识分子的根基”提供了注解。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卡尔·曼海姆以“自由漂浮的”、“非依附性的”^②来描绘知识分子，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搁浅了。几乎人人都认为，当今知识分子，或者说为数大大减少的一点残存的知识分子，都前所未有的地被束缚于公共机构的环境中。诺曼·波德霍雷茨于 20 世纪 60 年代曾代表右派谴责社会上知识分子消亡这一现象，他说：“自憎的表现形式是否定，与其说否定他们是谁，不如说否定他们在干什么。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学者，一名思想家，一名艺术家，或一名作家——并不表明成功，即使‘创作了传世文学杰作’亦不可谓成功。知识分子应该去改造这个世界。”^③另一方面，艾伦·沃尔德认为，成为独立的“批判思想家”的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超越意识形态本身的盲目控制的知识分子，这仅仅掩盖了纽约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向右派效忠的转变。^④为了改造世界，知识分子的理想目标，就是必须如左派人士沃尔德指出的那样，“高度参与”（萨特

语),或“有机地”(葛兰西语),而不是带着批判的心理保持自我的独立。^⑤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扎根于社会群体、社会事业以及社会运动。然而事实上,左派往往谴责知识分子过分顺利地扎根于现实——学术工作和职业、妥协性的机构、“背叛”以及“名额增选”等,谴责他们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根基不再遭到质疑,这为进一步的辩论和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共同基础。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的根基由什么构成?它究竟有何种价值和作用?如何从伦理上和政治上来区别这些有关知识分子根基的事实?“扎根”这个动词包含逻辑上对立而历史上并存的两层意思:(1)使束缚、局限于一定范围,限制其行动;(2)使建基、建立,充当奠基石。无论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还是福柯^⑥的“专家”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一问题将在本书 R·雷德克里斯南的论文中加以讨论——都确认“扎根”在第二层意思上的模式(延续并重叠,而非对立)。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这场辩论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知识分子可以同时在这两层意义中“扎根”。辩论的焦点并非仅仅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遗产,更多的是 60 年代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体制形式:有多少得到了保留,什么东西被改变了,出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还有什么必须予以剔除。为了引发这场辩论,本书的撰稿者已认识到“权力中的知识分子”这一提法(亦即保罗·波尔最近一部著作的标题)显然不再显得自相矛盾。^⑦他们开始注意具体环境中实施的权力以及由具体环境界定的权力,这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模棱两可的权力,也是一种自 B 氏们(贝内特、布卢姆、贝娄)反击以来一直处于险境的权力。这些文章致力于探求知识分子的具体社会地位、现状及“实例”,分析知识分子所“依附”(爱德华·萨义德常用的一个中性词)^⑧

的实际机构以及这种依附关系的政治价值，竭力辨明哪些是促使其发展的条件，哪些属于限制性条件。

更具体地说，不管是什么主题，这些文章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评述。人们普遍认为左派知识分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均扎根于美国的教育文化机构是其一大成功，但他们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失败”，一种背叛，一种衰落，甚至是知识分子的湮没。最具代表性的此类作品当推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学术时代的美国文化》。^⑨在一场辩论中，雅各比与艾伦·布卢姆的观点针锋相对，这一观点现已刊登在专门登载知识分子文章的期刊《欧亚杂谈》（1986 年春夏号）和《泰勒斯》（批判思想季刊，1987 年春季号）的知识分子专刊上。雅各比在文中谴责“学院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即左派知识分子为学术、职业和专业所同化，而这又剥夺了知识分子本身具有的公众角色和抗衡力量。“为知识读者写作的独立知识分子正在消亡。”（第 6 页）。“如今非学院知识分子正成为濒危物种。”（第 7 页）“至 20 世纪 60 年代高等学府实际上已垄断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第 8 页）

xiii

以上论述（阿尔方斯·泽尔纳在叙述法兰克福学派从军事情报局过渡到学院的报告中以不同的语气多次提到该论述）所体现出的怀疑主义态度的一个原因，其实是蕴涵于该书题目中的一个时代性讽喻。“最后的”知识分子因未能重塑自己，只能聚集于纽约派知识分子的周围，虽然并不局限于纽约派知识分子，而且，未能承先启后的“迷失的一代”正是指 60 年代的一代。正如林恩·加拉福拉所指出的，雅各比对于纽约派知识分子的称颂“忽视了他们在 60 年代种种行为的不良记录——谴责反文化，痛斥新左派，以及哀悼女性主义。如若纽约派知识分子后继乏人，那将是他们自己的过错。”^⑩现在称颂他们无异于